



# 第一章

---

## 绪 论

---

## 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修订版）

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兼翻译家，字子沅，笔名天用，祖籍安徽太湖县，出生于湖南沅陵。父亲朱延熙，进士出身。其母为清末洋务派首领、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胞侄女。朱湘自幼天资聪颖，6岁启蒙，7岁学作文，11岁入小学。1917年夏毕业于南京第四师范附属小学。1919年考入南京工业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开始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同年插班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1921年再升高等科，从此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后加入闻一多、梁实秋等组建的清华文学社，并与诗人饶孟侃（子离）、孙大雨（子潜）、杨世恩（子惠）过从甚密，一同获得“清华四子”的雅号。自1922年起朱湘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创作和翻译作品等。1923年冬，因不满清华学校课程的刻板安排，不守校规，被校方开除，随即离开清华来到上海，加入当时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6年他参与闻一多和徐志摩创办《晨报副刊·诗镌》的工作，提倡格律诗运动。同年在好友孙大雨及罗念生的说项下，终于获准回到清华就读。此后又创办《新文》，专登自己的创作和翻译。1927年9月获官费资助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朱湘于1929年9月提前回国，旋即应聘到安徽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1932年夏去职，漂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1933年12月5日凌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年仅30岁。<sup>1</sup>朱湘一生虽然短暂，却留下诗集数部：《夏天》（1925）、《草莽集》（1927）、《石门集》（1934）和《永言集》（1936），其中许多诗篇早已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此外他还写过不少散文随笔与诗歌批评，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名诗，其中包

1 参见秦贤次《孤高的沉江诗人——朱湘》，《文讯杂志》（台北）第39期（1988年12月1日）；孙玉石《朱湘传略及其作品》，《朱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215页；等等。

括散文和评论《中书集》(1934)、《文学闲谈》(1934),书信《海外寄霓君》(1934)、《朱湘书信集》(1936),译作《路曼尼亚民歌一斑》(1924)、《英国近代小说集》(1929)、《番石榴集》(1936)等。在这些作品当中,他的诗歌和散文早已为中国文坛所乐道,他的翻译诗歌却鲜有人论及。事实上,他的创作诗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翻译诗歌的经验,因而这些译诗就值得认真加以审视和重新评价。

## 第一节

### 朱湘译诗研究的目的与内容

当代以色列文化批评家和翻译理论家伊文·佐哈（Even-Zohar 1978）提出“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从异质文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指出它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情况：一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发轫期；二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危机或转型时期。<sup>1</sup>从翻译文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看，这三种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翻译文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变化，时而占据主导地位，时而被排斥到时代文化的边缘，这些都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大关系。<sup>2</sup>时代文学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需求，很大程度地影响着翻译文学的发展走势以及在中国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地位。

就具体的文学类型（literary genre）如翻译诗歌来考察，其翻译特点与 20 世纪文学翻译的总体特征基本吻合。也就是说，它在中国多元文学系统中时而占据着中心位置，时而被拒斥到

1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1978: 21-27.

2 参见范伯群、朱栋霖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张旭《译经文学传统与近代英诗汉译——从译入语看近代诗歌翻译方法上的嬗变》，《世界文学》（淡江）第 6 期（2002 年 12 月），第 139-158 页；等等。

边缘，时而又重新回到主导地位，并与中国诗歌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以此理念来观照那位活跃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格律派诗人兼翻译家朱湘，其诗歌翻译当处于佐哈所说的第一种情形，他的译诗所处文化背景正好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青年”期。朱湘作为近现代中国首部西诗汉译集大成之作的推出者，在白话文学演进的初始阶段，曾刻意“用世界的眼光去介绍”西方诗歌，并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两极间开展过一系列协调工作。这些协调或称“中庸”的举措在汉语诗学体系重建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他为当时中国新格律体译诗规范的建设以及“中国诗学的复兴”做出了不朽贡献。就此开展的研究，理应构成当今汉语学界盛行的“文学反思”和“重写文学史”<sup>3</sup>活动中的重要一环。然而时至今日，无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翻译文学史中，都鲜有人对其译诗活动做过全面、系统的考察，也未曾出现任何一部有关朱湘译诗研究的专著，更不用说从翻译规范（translational norms）的角度着眼于形式层来关注这位诗人的翻译作品，这多少与时代文学和文化重建的呼声显得不相协调。

本研究试图运用现代翻译批评理论，以诗人朱湘为研究个案，讨论他的译诗活动和翻译成就。其目的有二：第一，运用现代西方描写翻译学思想，尝试在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在历史的语境中根据翻译规范理论，将翻译文学这一相对独立的系统置于具体的文学坐标系内，对人称“中国的济慈”<sup>4</sup>的朱湘之

3 自 1988 年《上海文论》第 4 期起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由陈思和与王晓明主持，每期发表两篇文章，对“五四”以来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价，以打破或推倒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模式和结论。其中包括谢天振就翻译文学史的重新撰写问题展开的讨论，颇具启迪意义。参见陈思和《重写文学史》，《笔走龙蛇》（台中：业强出版社，1991），第 76-90 页。

4 参见鲁迅《集外集拾遗·通讯（致向培量，[1924 年]4 月 23 日）》，《鲁迅全集》（卷 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 676-677 页。该信最后一段文字如下：“《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檳榔集》两篇。第三集为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已掉下去，没有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译诗活动做历史重构和系统描述。第二，尝试运用翻译规范理论，根据主体诗学系统内既有的形式规范，以及译者所处时代业已形成的译诗规范，以翻译诗歌形式层为切入点，对朱湘现存的百余首译诗进行考察。也就是通过译入语的择取、译诗形体建构以及译诗语言音乐化效果这三方面的追求，审视他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何种翻译规范，或对既有翻译规范进行了怎样的改写或改进，以揭示其为当时中国新格律体译诗规范建立做出的贡献。

本课题试图解决两个主要问题：诗人曾经翻译了什么？他又是怎样翻译的？诗人曾经翻译了什么本不应成为一个重点考察的问题，它对于任何研究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期性文献工作，但对于朱湘的译诗研究却是一个特例。因为以往对朱湘的译诗研究一直存在许多盲点，历来就此展开的梳理工作还很不够，特别是他使用的源语（source languages）情况极为复杂，导致人们长期对他的译诗问题不敢问津。学界后来即便得出过一些结论，但这些结论也显得过于草率，又颇具误导性，长期以来又为中国新文学界所沿用，造成若干不良影响。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从文献学（bibliographical approach）的角度，通过朱湘的译诗、创作、书信，以及时人留下的评介文字、文艺思想文章和传记材料，对其译诗活动与翻译成就做一次全面、系统的描述。其次，立足于翻译诗歌这一本位，通过版本校勘和文本比照，对过去就朱湘译诗研究中留下的若干历史盲点进行探微，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角度讨论其译诗发表情况；在对诗人译诗使用的源语情况进行梳理的时候，如遇某些源语线索完全中断的情形，笔者则尝试采用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 studies）研究常用的“悬搁”（suspending）和“加括号”（bracketing）的办法，对局部问题暂且存而不论。最后，再将朱湘的翻译活动置于主体文化范畴内，讨论其译诗的成构特色

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进而探讨它在主体文化系统内的地位。

关于诗人是怎样翻译的问题，在此将以描写翻译学的方法展开研究，并以翻译规范为讨论问题的依据，以翻译诗歌的形式层为切入点，将朱湘翻译的百余首译诗置于多元文化系统中，进行向心式文本观照（textual analysis）。其目的是体察他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什么翻译规范，或对既有翻译规范做出了何种改写或改进，进而考察他为当时中国新格律体译诗规范建立做出的贡献。本来诗歌是“形”（form）与“质”（matter）紧密统一的整体，<sup>5</sup>形式又常被视为诗歌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近现代白话新诗革命首先就是从形式革新入手的。由于诗歌与语言血肉相连，翻译又自语言间的转换始，因此笔者以朱湘译诗的形式层为切入点，从译入语的择取，到他利用目标语的形式特质，即视觉图像和听觉声音等，来充分实现他们那一类诗人标举诗歌“三美说”<sup>6</sup>中的“建筑美”和“音乐美”，进而考察译者是如何通过翻译诗歌来实现他“尽言”“尽象”“尽意”之目的。换句话说，笔者要通过朱湘的现存译诗文本，从翻译规范的角度着眼于中国文学体系，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参照汉语诗学中曾经有过的形式规范，从最早的文言格律体，到后来的词、曲等，再到白话新诗时期已有的各种规范，如韵律、节奏和声调等形式规范以及译者所处时代业已呈现的译诗规范，来描述朱湘的翻译诗歌。有了这些不同形式的翻译规范为参照系，可以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遵循原文的诗学规范抑或是目标语系统的诗学规范。在具体的分析中，将不断地叩问三个主要问题：译者在译入语的使用上遵循了何种翻译规范并做出何种新的探索？译者如何通过字数与音顿排列组合以及诗体外形变化

5 宗白华. 新诗略谈. 宗白华全集（卷1）.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82.

6 闻一多. 诗的格律. 晨报副刊·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 闻一多全集（三）. 249.

来营构诗歌的建筑美？译者如何通过诗歌语言的音韵效果使其译诗富有音乐美？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对翻译成品的描述和追问，能够从某种维度体察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流露的译学思想和价值取向。其间还可以考察译者采取翻译策略时的理据是否充分，从读者期待规范着眼又可以体察其译诗所涉及的接受问题。进而再将这些翻译作品置于主体诗学体系内，在文化互动层可以了解到它们所发挥的巨大文学功能。

这里需要表明的是：在这一描写研究过程中，翻译将被看成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事件，历史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都将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描述，在此基础上再对文学交流、接受、影响、传播等问题加以思考。然而历史的事实本身并不“叙述”，它仅给人以“陈列”。“叙述”与“陈列”的区别就在于：“叙述”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意识，而“陈列”只是呈示而已。考虑到本研究最终目的是对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的译诗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模筑力量做理性判断，其视角的不同会影响到叙述方式，因而本研究的重点是在对诗人的译诗活动进行正本清源式梳理的基础上，根据主体诗学规范以及汉语译诗界业已呈现的形式规范，以翻译诗歌形式层为切入点，来考察朱湘的译诗活动。这一研究的首要首先是如何透过现有呈散点式分布的文献来做好相应的历史事实重构；其次是从翻译诗歌和民族文学的结合上寻找切入点，以平行阐释的方法来“陈列”诗人是如何在两种不同诗学体系间采取种种协调举措，如何遵循现有的翻译规范，同时又对它进行修正和改写，从而为新格律体译诗规范建立做出怎样的贡献；最后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思辨，总结出若干规律，这对指导中国未来诗歌翻译和创作都将有着深远意义。





## 第二节

### 朱湘译诗研究的反思与启示

由于朱湘的诗艺追求总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范围之外，加之他那独特的文风及其“非常孤傲，自视很高”<sup>1</sup>的性格又与周遭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因而相对于其他二三十年代同期的诗人兼翻译家，汉语学界对这位“文艺怪杰”<sup>2</sup>的译诗活动开展的研究较为薄弱。

过去对朱湘的译诗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彼此不相衔接的阶段，第一阶段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阶段始于 80 年代后期。对朱湘的译诗进行非系统性评述最先是在其友人圈内进行的。如早年就盛传过他有意“误译”英国诗人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一诗，惹起了一场有趣的文艺争辩。<sup>3</sup>自朱湘的《番石榴集》出版以后，诸评论家及其友人如胜已、常风（原名常凤瑒）、罗念生等先后在《文学与人生》《大公报》等媒体上撰文评介，其评论大多集中于译家的翻译技巧、译入语的择取和对原作的忠信等问题，讨论仅限于译文与原文之间对等问题，很少涉及文

1 何家槐·朱湘之死·申报·自由谈·1933-12-17。

2 柳无忌·朱湘《文学闲谈》序·痖弦编·文学闲谈·台北：洪范书店，1978：4。

3 参见朱湘《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一封致〈文学旬刊〉编辑的公开信》，《京报副刊》第 85 号（1925 年 3 月 11 日）；朱湘《一封致友人饶孟侃的公开信》，《京报副刊》第 102 号（1925 年 3 月 28 日）；王宗璠《与王剑三谈译诗的通信》，《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 62 号（1925 年 2 月 25 日）；王宗璠《读了“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后》，《京报副刊》（1925 年 3 月 15、16 日）；饶孟侃《“春风吹又生”》（上、下），《晨报副刊》第 51、52 号（1925 年 3 月 8、9 日）；饶孟侃《“野火烧不尽”——告“盲目的读者”的作者》，《京报副刊》第 96 号（1925 年 3 月 22 日）；等等。

化批评层面，更不用说在目标语文化体系内部来展开讨论。在诗人步屈子后尘（1933年冬）的几年内，社会上曾时兴过撰写追忆诗人的纪念文章，间或有人附带提及其译诗问题，其评述均属点到为止，甚少有过系统深入的论述，但其中提供的若干有关朱湘译诗活动的线索，又颇具学理价值。<sup>4</sup>客观地说，当年学界对朱湘译诗的关注如能再持续一段时期，肯定会有更加全面深入的发现。不幸的是，卢沟桥的战火摧毁了中国新文艺园地的宁静，国内政局与社会急剧动荡，加之他那若干诗学主张与主流文艺思潮不甚吻合，于是在有意与无意间，朱湘的名字为人淡忘了近半个世纪。

朱湘在文坛上的再度复活是在他生前挚友罗念生所说的“朱湘年”，即诗人逝世50周年祭的1983年。<sup>5</sup>当时随着国内学术环境的改善，一些学术禁区被打破，以往根本不敢涉足的领域陆续得到垦殖，一些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学界对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首先是随着他学术名誉的恢复和作品重印，以及有关其遗著的评介文字不断刊载，新版《朱湘译诗集》也在1986年由人整理出版，自此中国译论界又刮起一股“研究朱湘风”。除该集编选者通过“序言”和“后记”方式发表评论外，<sup>6</sup>也有人专门撰文，<sup>7</sup>或在自己的著作中开辟单独章节，<sup>8</sup>讨论诗人的译诗主张和翻译特色等问题，其论述较前一阶段相对集中，也更为深入。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已开始不自觉地把诗人

4 参见胜己《〈番石榴集〉述评》，《人生与文学》3卷4期（1936年）；常风《番石榴集》，《大公报》第249期（1936年4月）；罗念生《关于〈番石榴集〉》，《人生与文学》2卷4期（1937年4月10日）；等等。

5 柳无忌．诗人朱湘的复活．读书．1988（12）：60．

6 洪振国编．《朱湘译诗集》后记．朱湘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335-344．

7 陈耀球．评介《朱湘译诗集》．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

8 钱光培．现代诗人朱湘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292-311．